

《红楼梦》牙牌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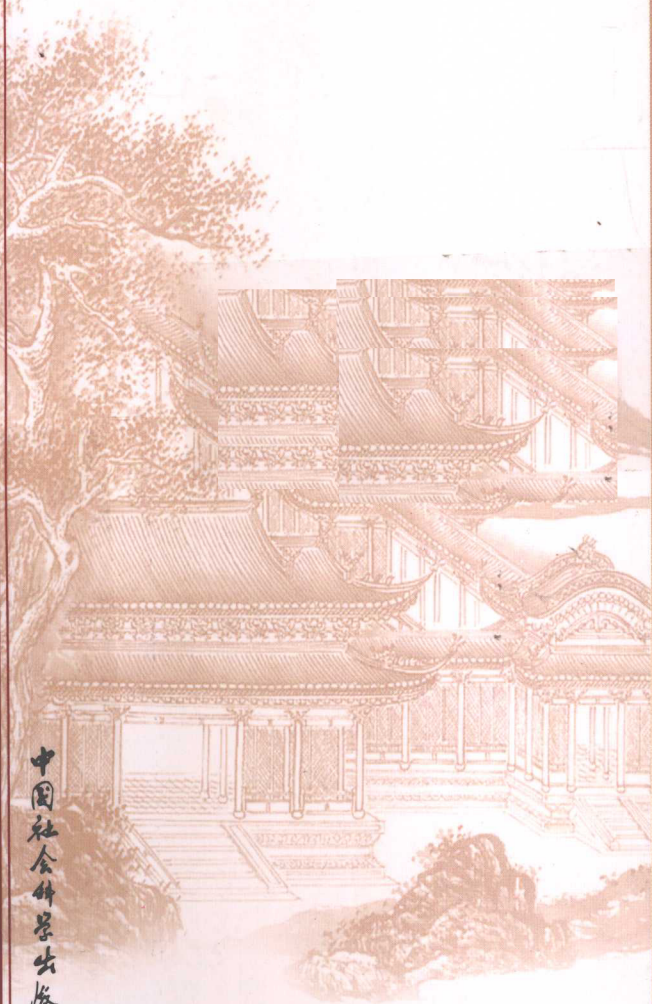
语·符·多·义·模·式·研·究



王德福

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王德福 著

《红楼梦》牙牌令

语符·多
义·藏·模·式·研·究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红楼梦》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/王德福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5004-8530-8

I. ①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7234 号

责任编辑 陈彪
特约编辑 李登贵等
责任校对 周昊
封面设计 张建军
技术编辑 戴宽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

电话 010-84029450 (邮购)
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广增装订厂

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 8.375

字数 218 千字

定价 2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课题得到渤海大学学科建设出版基金和辽宁省
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“渤海大学应用
语言学研究中心”的资助

序 言

王希杰

一、作者王德福博士

专著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的作者是王德福博士。王德福是南京大学文学博士，专攻现代语言学。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《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）。王德福对叶尔姆斯列夫的研究是从硕士生时候就开始的，攻读博士阶段主攻叶尔姆斯列夫和丹麦学派，博士后期间继续研究这一课题。博士后出站后，教学之余，仍一如既往地研究叶尔姆斯列夫和丹麦学派。王德福博士比较好地把握了欧洲的结构主义理论，他的专著《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

王德福博士的《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》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。《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》使王德福博士成为中国真正懂得叶尔姆斯列夫和丹麦学派的第一人。他的《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》放到世界语言学中去，也是学术精品。在欧洲，这样的研究性专著也是不很多见的。因为欧洲学者也认为叶尔姆斯列夫的著作很难把握。王德福博士在三年硕士生、三年博士生、两年博士后期间，发表的论文不是很多。他不急于求成，能够耐得住寂寞，在学风浮躁的今天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

同样可贵的是，王德福博士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。丁

玲的“一本书主义”曾遭到过批判。其实，一个学者在一生中有一本像样的书就很不错了。然而，王德福博士没有停止探索而是继续向前进，又拿出了一部新的专著——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。

好几个月之前，王德福通过邮箱把书稿传给我，请我写序言。10月他到南京，在我家，问我：是不是不满意这一著作。我说，我没有看到过，不知道这事情。第二天，他去打印装订了一册，并把电子文本传给我。我阅读之后，很是高兴。但是，序言却拖到现在。

二、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

在中国的大学里，语言学和文学（准确地说是“文学研究”）是分离的、对立的。搞语言学的不过问文学问题，搞文学的也不关心语言学问题。甚至，研究文学的是“语言学盲”，搞语言学的是“文学盲”，而且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。

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不像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著作，甚至也不像一本通常意义上的修辞学著作。在文学研究者看来，这不应是语言学家的著作，倒应当是文学研究的著作。文学界将会惊讶于作者如此熟悉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，而不敢相信作者居然是语言学家。在中国的文学研究者的眼里，中国的语言学家不关心文学，而且已不会研究文学。

王德福博士想像罗兰·巴特（Roland Bart）当年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《萨拉辛》所作的分析那样来研究《红楼梦》。他所考察的文本只是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中的牙牌令。全部文本不足1800个汉字。面对这么短的一个文本，王德福博士如何能写成一本十七万字的专著呢？

现在，“国际接轨”是一个流行语词。可关键是在什么问题

上跟国际接轨，如何去跟国际接轨？王德福博士的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是一次国际接轨的学术活动，在我看来。结构主义是西方 20 世纪的学术思潮，尤其是法国学术思想的主潮。其特点是多学科的交融。语言学中结构主义迅速地在其他人文、社会学科扩散，开花、结果。在人类学，在哲学，在文艺学……中国的语言学家是关门研究结构主义的，基本不管其他人文、社会学科的“瓦上霜”。连方光焘那样的学者，他本是文艺理论家、小说家，也不关心结构主义在中国其他学科的应用问题。中国的其他人文、社会学科研究者是直接外国同行那里进口结构主义理论的。

王德福的这一著作的出版，将促进中国人文、社会各个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。近年来，不同学科的对话已经受到了注意，但是多学科的真正对话交流事实上并没有开展起来。

西方人，早就运用结构主义学说来分析《十日谈》、俄罗斯民间故事、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、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等，并取得了成功。20 世纪，我多次呼吁中国修辞学界也能够这样做。但是我自己从没有想到过这样做。

王德福博士做到了，而且成功了。这也证明了方光焘老师当年的教导是正确的，真正的学术研究就应当是这样进行的。这是令人高兴的。

记得我大四时写作学年论文第一次到指导老师方光焘教授家去，他就对我说：“真正的学术研究是：在基本理论原则指导下，运用科学的方法，详细考察语言材料，再上升为理论体系。”在讨论朱德熙《说“的”》一文的时候，方光焘强调，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在没有真正弄清楚之前，不可以胡乱运用到汉语上来。不可以把自己的错误理解和胡乱运用归罪到人家的理论上去。他主张：只有真正地把握住了，才可以运用到汉语中来。王

德福博士在完成《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》之后，运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来考察《红楼梦》中的一段特定文本，当然就得心应手了，这才能够顺利完成这部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。

在阅读王德福博士的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的时候，我想，如果方老师在世，他会肯定地说：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著作。我以为，方光焘老师还应当高兴，因为王德福博士是他的再传弟子，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学术传统。

三、《红楼梦》和红学研究

《红楼梦》的英译者大翻译家杨宪益在我写作序言期间走了，享年 97 岁。杨宪益是我老师赵瑞蕻的夫人杨苡的兄长。《红楼梦》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。“红学”在中国是一门显学。红学研究高手林立，成果辉煌，后辈学者似乎已经很难进入其中了。

我是红学的门外汉。我朦胧地感觉到，红学似乎面临着两个问题：过多关注《红楼梦》文本之外的事情了，热衷考证，忽视了对文本本身的研究；在对文本本身的研究方面，其方法又似乎显得有点陈旧，例如修辞学家总是从辞格、人物语言个性化等方面来进行考察。因此，红学需要在方法论上更新。

王德福博士的这部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，完全不同于王蒙、刘心武等人所做的研究，也完全不同于胡适之、周汝昌等学者的研究方式。王德福博士第一次全面地彻底地运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来研究《红楼梦》，他的研究是成功的。本书的出版将推动《红楼梦》研究开拓出新道路，来一个方法论的更新。

本书所考察的虽然只是《红楼梦》中不到 1800 字的一小段文本，但是由于选材具有样本性和同构性，其价值就绝不是这一个短小文本的事情了。这 1800 字，在《红楼梦》中之所以具有样本性，就在于它跟整部《红楼梦》具有同构性。所以，考察对象虽小，其理论价值却具有普适性。其结论也适用于整部《红楼梦》，甚至也部分地有条件地适用于其他古典小说名著结构的描写、分析。

王德福博士对《红楼梦》中的牙牌令文本作了深入探索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整个《红楼梦》文本结构特点的一个考察。作者廓清了《红楼梦》文本结构多义性的理据，从对这一小段文本的研究中，总结出《红楼梦》多义结构的基本模式是：

(1) 能指符号分为能指符号和能指符号聚合两种。组合能指符号的组合，分为两种模式：层级组合模式与网络式组合模式。网络组合模式则是主要模式。能指符号的聚合可以分为：单向聚合与多向聚合两种模式。依据对立互补原则形成的多向聚合模式是《红楼梦》最重要的语符聚合方式。

(2) 所指符号的组合分为四种模式：线状模式、链状模式、环状模式和网状组合模式。其中，网状组合模式最为复杂，它兼容了前三种模式，它是《红楼梦》作者最广泛运用的一种模式。所指符号的聚合主要是对立互补模式，这与西方的并列从属模式有本质区别。

(3) 能指、所指符号的结合分为：对应模式、扇状模式、塔状模式、螺旋状模式等。

至于《红楼梦》文本符号的构造模式所依据的基本原理，王德福博士认为是：就语言符号自身遵循的客观规律而言，凭借

语言符号任意性和约定性，充分利用符号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，实现语言符号内部、语言符号系统之间以及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译；就语言符号使用的认知规律而言，主要是作者充分运用文本不同人物、作者、读者等形成的复式视点，构造文本语符的多义结构。而这两种规律都服从于“齐一”的认识论原理。

这是红学研究的新收获，开拓了全新的风气。红学研究应当重视文本本身。应当运用新的研究方法。我相信，王德福的这部著作的出版将引起红学界的注意。我这样说，意思并不是：《红楼梦》的研究者和阅读者都能够接受王德福的分析和结论，且会有许多研究者也这样去研究《红楼梦》。一段时间内，这样去研究《红楼梦》及其古代小说的人，不会很多的。因此，这部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很是有方法论更新意义的。当然也可以促进和推动其他古典小说研究方法论的更新。

四、研究策略

王德福博士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三个基本目标：

(1) “红学”研究重心的转移，即尽可能把文本系统作为研究对象，以文本证明文本；

(2) 方法和方法论的创新，即在探寻文本构造模式以及作者创造文本方法的同时，也要找到科学有效地研究文本系统的方法论和方法；

(3) 通过揭示《红楼梦》文本构造模式，探究其内在的认知结构，以便进一步揭示《红楼梦》的知识论体系。

这三个目标很大。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呢？从哪里着手呢？突

破口又在哪里？这可是一个问题。

王德福博士的这部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所考察的，只是：

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齐整，上面左右两张榻，榻上都铺着锦裯绒毯，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几，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荷花式的，也有葵花式的，也有方的，也有圆的，其式不一。一个上面放着炉瓶，一分攒盒，一个上面空设着，预备放人所喜食物。上面二榻四几，是贾母、薛姨妈；下面一椅两几，是王夫人的，余者都是一椅一几。东边是刘姥姥，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。西边便是史湘云，第二便是宝钗，第三便是黛玉，第四迎春、探春、惜春挨次下去，宝玉在末。李纨、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，二层纱厨之外。攒盒式样，亦随几之式样。每人一把乌银洋鍱自斟壶，一个什锦珐琅杯。

……

凤姐忙走至当地，笑道：“既行令，还叫鸳鸯姐姐来行便好。”众人都知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，故听了这话，都说：“很是。”凤姐儿便拉了鸳鸯过来。王夫人笑道：“既在令内，没有站着的理。”回头命小丫头子：“端一张椅子，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。”鸳鸯也半推半就，谢了坐，便坐下，也吃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酒令大如军令，不论尊卑，惟我是主。违了我的话，是要受罚的。”王夫人等都笑道：“一定如此，快些说来。”鸳鸯未开口，刘姥姥便下了席，摆手道：“别这样捉弄人家，我家去了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这却使不得。”鸳鸯喝令小丫头子们：“拉上席去！”小丫头子们也笑着，果然拉入席中。刘姥姥只叫：“饶了我罢！”

鸳鸯道：“再多言的罚一壶。”刘姥姥方住了。

鸳鸯道：“如今我说骨牌副儿，从老太太起，顺领说下去，至刘姥姥止。比如我说一副儿，将这三张牌拆开，先说头一张，次说第二张，再说第三张，说完了，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。无论诗词歌赋，成语俗话，比上一句，都要叶韵。错了的罚一杯。”众人笑道：“这个令好，就说出来。”

鸳鸯道：“有了一副了。左边是张‘天’。”贾母道：“头上有青天。”众人道：“好。”鸳鸯道：“当中是个‘五与六’。”贾母道：“六桥梅花香彻骨。”鸳鸯道：“剩得一张‘六与幺’。”贾母道：“一轮红日出云霄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便是个‘蓬头鬼’。”贾母道：“这鬼抱住钟馗腿。”说完，大家笑着喝彩。贾母饮了一杯。

鸳鸯又道：“有了一副。左边是个‘大长五’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梅花朵朵风前舞。”鸳鸯道：“右边还是个‘长五张’。”薛姨妈道：“十月梅花岭上香。”鸳鸯道：“当中‘二五’是杂七。”薛姨妈道：“织女牛郎会七夕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‘二郎游五岳’。”薛姨妈道：“世人不及神仙乐。”说完，大家称赏，饮了酒。

鸳鸯又道：“有了一副。左边‘长幺’两点明。”湘云道：“双悬日月照乾坤。”鸳鸯道：“右边‘长幺’两点明。”湘云道：“闲花落地听无声。”鸳鸯道：“中间还得‘幺四’来。”湘云道：“日边红杏倚云栽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‘樱桃九熟’。”湘云道：“御园却被鸟衔出。”说完饮了一杯。

鸳鸯道：“有了一副。左边是‘长三’。”宝钗道：“双双燕子语呢喃。”鸳鸯道：“右边是‘三长’。”宝钗道：“水荇牵风翠带长。”鸳鸯道：“当中‘三六’九点在。”宝

钗道：“三山半落青天外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‘铁锁链孤舟’。”宝钗道：“处处风波处处愁。”说完，饮毕。

鸳鸯道：“左边一个‘天’。”黛玉道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。”宝钗听了，回头看着他。黛玉只顾怕罚，也不理论。鸳鸯道：“中间‘锦屏’颜色俏。”黛玉道：“纱窗也没有红娘报。”鸳鸯道：“剩了‘二六’八点齐。”黛玉道：“双瞻玉座引朝仪。”鸳鸯道：“凑成‘篮子’好采花。”黛玉道：“仙杖香挑芍药花。”说完，饮了一口。

鸳鸯道：“左边‘四五’成花九。”迎春道：“桃花带雨浓。”众人道：“该罚！错了韵，而且又不像。”迎春笑着饮了一口。

原是凤姐儿和鸳鸯都要听刘姥姥的笑话，故意都命说错，都罚了。至王夫人，鸳鸯代说了，过下便该刘姥姥。刘姥姥道：“我们庄家人闲了，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，但不如说的这么好听。少不得我也试一试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容易说的。你只管说，不相干。”鸳鸯笑道：“左边‘长四’是个人。”刘姥姥听了，想了半日，说道：“是个庄家人罢。”众人哄堂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说的好，就是这样说。”刘姥姥也笑道：“我们庄家人，不过是现成的本色，众位别笑。”鸳鸯道：“中间‘三四’绿配红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大火烧了毛毛虫。”众人笑道：“这是有的，还说你的本色。”鸳鸯道：“右边‘幺四’真好看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一个萝卜一头蒜。”众人又笑了。鸳鸯笑道：“凑成便是一枝花。”刘姥姥两只手比着，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

这里只有不到 1800 个汉字，而且是游戏笔墨，在《红楼梦》中似乎是可有可无的。我甚至设想，当年某些个《红楼梦》

的手抄者，也许会省略去了的吧？少了这 1800 字，《红楼梦》一样的伟大。《红楼梦》的读者和研究者，注意这段话语的，大概不是很多的吧？它是经常被忽视了的。这一文本，以往可能至多是写作语言随笔小品的资料，只能够用来写点短小的文章。王德福博士却用它写成了专著，这里面就涉及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策略问题。

我说过，写作有两种：大题小做；小题大做。“大题小做”者，题目很大，例如：《论人类文明》、《论语言的本质》、《论资本》、《论教育》等，但是只写了三百个汉字、三四千个汉字，蜻蜓点水，敷衍了事，不痛不痒。“小题大做”者，题目很小，选取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都小，可立足点高，视野开阔，能积极向广度和深度进军，多角度多层次广泛地联系，深入地挖掘。王德福博士的这一专著当属后者。

作者所考察的虽然只是牙牌令，但是，并不是孤立地考察这 1800 来个字，而是密切联系整部《红楼梦》。不单是把牙牌令文本作为《红楼梦》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而且强调的是：这牙牌令对《红楼梦》具有样本性和同构性。如果这牙牌令跟整个《红楼梦》没有同构性，那么花费如此之大的精力来加以研究就没有必要性了。作者不是仅仅为了牙牌令而研究牙牌令，而是为了整部《红楼梦》来研究牙牌令的，甚至是为了全部古典小说来研究牙牌令的，甚至更是将这 1800 来字联系着中国传统文化去考察的。因此，也可以说，这部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，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解读。同这些年来出现的许多运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相比，这部著作也是很有特色的。

王德福博士的这项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鉴赏活动，而是一种理论研究。王德福在这一著作中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，不是

彼此独立的、孤立的，为的是服从于一个目的：探索《红楼梦》文本的多义模式和基本理据。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的学术价值就在于，它不是分析完就结束了，而是上升为新的理论。

所以，研究者只有选择了比较好的研究策略，才能保证顺利地实现预定的研究目标。王德福的研究策略保证了他比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目标。

五、修辞学与语义学

王德福的这部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也是中国修辞学的新收获，对修辞学研究也有方法论的启示。编码和解码是逆向同构的，这一著作是阐释学的研究，也是修辞学的研究。作者是从解码入手，还原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编码活动。

这样做，作者必须很熟悉现代语言学理论，熟悉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学说，还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，熟悉《红楼梦》当然更是不在话下的。而且还需要有耐心和细心，自愿坐冷板凳。如果从硕士生算起，王德福博士就坐了十来年的冷板凳了。前辈学者提倡，“板凳要坐十年冷。”他真的是做到了。在一些学者中出现了浮躁风的今天，在抄袭成风的中国学术界，王德福博士拿出了这样的修辞学著作，这是很叫人高兴的一件事情。更让那些全盘否定修辞学的人无地自容的。中国修辞学研究者经常抱怨修辞学不被重视，被边缘化！我一再说，不要责怪人家，找自身的原因。修辞学应当做到人家不能不重视的地步。西方语言学为什么被重视？西方修辞学为什么被重视？因为它给其他学科提供方法论原则。中国语言学、汉语修辞学，为其他学科提供了什么？如果没有，就很难责怪人家的不重视了。王德福博

士把修辞学同《红楼梦》研究结合起来，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，对《红楼梦》作深入分析，这将提高语言学和修辞学在中国人文学科中的地位。有人提出开高档次的会议来提高修辞学的地位，我认为那不是好办法。我主张像王德福这样用自己的研究来提高修辞学在中国的地位。

现在，有些文章，用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的篇幅来介绍西方的某个学说。例如，认知语言学什么的；然后用来（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……）考察某个问题，或者某个现象，对西方的介绍不深不透，往往是流行的说法，其运用也比较肤浅，常常停留在贴标签的阶段。中国修辞学在引进西方理论方面，不能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，不能只是简单地生搬硬套，不能仅仅胡乱贴标签。王德福博士这部著作，在引进西方理论方面给中国修辞学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。

在语言学中，语音学、语法学等是较为精密的学科。比较而言，修辞学就缺乏精密性，含混和模糊几乎是修辞学的社会形象。这是应当改善的。王德福博士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语言符号，是牙牌令，可是他努力追求精密化。例如，关于对立互补原则，他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，认为对立互补原则实际包含了三条规则：

（1）对立规则。这还可衍生两条次规则：文本的能指（符号）对立或所指（符号）对立；

（2）互补规则。同样可衍生两条次规则，即文本的能指（符号）互补或所指（符号）互补；

（3）对立互补原则。这条规则相对复杂，因为它可以衍生四条次规则，即能指（符号）对立而所指（符号）互补；所指（符号）对立而能指（符号）互补；能指（符

号)与所指(符号)同时对立;能指(符号)与所指(符号)同时互补。

修辞学的进步在于,即使是模糊的语言单位,即使是模糊的言语作品,即使是模糊的修辞说法,修辞学研究者也应采取精密化的方法去研究。修辞学论著不能是模糊的含混的。修辞学应当追求严密的、简明的理论体系。这个体系内部要尽量避免矛盾。内部自相矛盾是一些修辞学论著很难避免的一个缺陷。

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的核心问题,其实揭示的是意义和形式这一对矛盾。语言学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形式和意义问题。亦即:符号的能记和所记之间的关系。符号的能记和所记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复杂的。

归根结底,语言学是一门形式的科学,是形式之间关系的科学。形式是负载、表达内容的形式,不负载、不表达内容的,就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。我们所关注的是为特定形式所负载的内容,没有相应的负载体的内容,我们不考察它。这个问题也牵涉到语法学。中国有的语法学家,强调汉语的“意合法”,老实说,我不敢苟同。不通过一定形式,就根本不能传达任何意义。完全不负载在特定形式上的意义,不是语言学所要研究的。任何复杂的意义都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负载,来表达。最简单的形式也是形式。没有形式的内容,假如有,也绝不是语言学所研究的。王德福博士的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,更是一部语言学著作,其所探索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,也是语法学问题。

同时,《〈红楼梦〉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》还是一部语义学著作。王德福博士读硕士生的时候,就认真研读了格雷马斯的《结构语义学》。王德福博士这部专著的核心目标是探索语言